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 研究/丛书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丛书主编：陈红民

陈红民 主编

# 中外学者论 蒋介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 研究/丛书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丛书主编：陈红民

陈红民 主编

# 中外学者论 蒋介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学者论蒋介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陈红民主编.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308-10976-5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蒋介石(1887~1975)  
—人物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7993 号

## 中外学者论蒋介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红民 主编

---

责任编辑 葛玉丹

封面设计 回归线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好友排版工作室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58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976-5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 总 序

## 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

---

当从编辑处获知“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稿已通过程序,可以出版的佳音时,觉得是喜从天降,不能自己。此前漫长而无奈的等待,令人沮丧到快要抓狂。

开始酝酿丛书序言,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继而浮现否定的声音:这个题目太大,太感性,我们做的工作还很少,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中充其量只能有个很小的位置,绝对担不起这么个大标题。然而,清理思路的过程中,“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这几个字却魂牵梦绕般地不停跳出,挥之不去。思量许久,乃定以此为题。虽然尚未做到,但我们有此追求,将愿景写出自励,悬为未来之鹄的,亦无不可。

况且,中外史学界研究蒋介石的学术著作与通俗作品虽已相当丰富,精品迭出,然而“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作为首套系统的学术丛书,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上,一定会有其应得的地位。

## 二

蒋介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而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至今仍在,对其研究的重要性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却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有时现实对学术的影响甚至是更为紧要的。我在《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一文中写道,回顾学术史,制衡蒋介石研究的因素很多,包括中国大陆自身的社会发展、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界研究观念的变化、两岸关系的演变、学术交流与史料的开放程度等。其中,尤以学者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为甚。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陆地区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环境总体上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2010年初,美国的《世界日报》采访我时,对浙江大学能够建立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并将主办第一届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感到惊讶,反复询问原因。我的答复是: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与雅量,能公平客观地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包括蒋介石。这绝非“外交辞令”,而是基于个人经历的真切感受。1982年南京大学在大陆高校系统首次招收一名“中华民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之后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耳闻目睹了前辈学者在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之路上的艰难跋涉。学术研究的发展,也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今天,蒋介石研究的环境仍有不如所愿之处,然而,却是前所未有的宽松,是最好的时机。就此而论,我们确比前辈学者幸运太多!

近10多年来,随着大量珍贵资料,尤其是蒋介石档案与蒋介石日记开放,相关学术研究已从“险学”变成“显学”,成为海内外史学界引人注目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学术单位与学者介入其中,海内外史学界已经开过数次关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初显规模。

## 三

浙江大学作为蒋介石故乡的大学,其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在蒋介石研究方面拥有独特的地域优势,前辈学者做了开拓性探索。20世纪60年代,杨树标教授曾参与何干之教授领衔的《蒋介石传》写作组的工作,此项目中途夭折,杨教授却矢志不移,终于在1989年出版了《蒋介石传》,引领大陆史学界风气之先,在海内外影响甚大。

为回应时代变化与学术潮流,推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秉承国际性、前沿性、现实性与可持续性的学术理念,浙江大学于2007年1月建立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此为海内外首个以蒋介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中心成立后,致力于推进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化与国际化,与海内外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延聘海内外相关领域的30余位学者为客座教授,其中既有张宪文、杨天石、张玉法、蒋永敬、山田辰雄、西村成雄、马若孟(Ramon H. Myers)等知名的资深学者,又有王建朗、陈谦平、吴景平、杨奎松、马振犊、吕芳上、黄克武、裴京汉、家近亮子、川岛真、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圭德(Guido Samarani)、米德(Rana Mitter)等各国各地的学术领军人物。已有十几位海内外学者先后在中心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中心研究人员广泛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应邀参加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学术会议40余次;应邀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术单位举行讲座近20次。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是中心推动蒋介石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又一重要举措。自2007年以来,中心先后共举办2次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3次蒋介石研究工作坊,与海内外研究机构合办国际性学术会议2次。其中,2010年4月主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大陆地区首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2012年6月,中心联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HSTCC)等单位举办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暨第二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1840—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心创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网站(<http://www.ch.zju.edu.cn/jjsandchina/index.php>),为蒋介石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该网站适时发表研究动态,提供学术信息,汇集研究资料,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培养新一代学者对蒋介石研究的兴趣,扶助年轻学者的成长,中心与恒励集团共同推出“恒励集团研究生论文资助计划”,面向海内外,资助以蒋介石为主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迄今已资助五届,计有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及浙江大学等学校的18名硕士博士研究生获得。获此资助的同学有的毕业后继续从事蒋介石相关的学术研究,已经小有成就,收入本丛书的几部著作,就是作者在毕业论文基础上改定的。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白手起家,经过五年多的辛勤努力,从无到有,已在学界小有声誉。可以自豪地说,中心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成立之初的设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是在浙江大学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建立与成长起来的,同时还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资助。浙江恒励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张克夫董事长、张甬江总经理慷慨捐助资金,对中心的各项活动始终予以支持。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对中心的网站曾予以惠助。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胡春惠教授数次支持中心的学术活动。浙江奉化溪口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亦一直对中心的活动鼎力支持资助,双方已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合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愿意与蒋介石中心合作,将出版相关研究成果作为重要工作,黄宝忠副总编辑、葛玉丹编辑为丛书的出版投入大量心力与时间。没有他们的惠助,出版进程肯定更加坎坷。

#### 四

出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是中心建立之初就确定的目标

之一。有无高水平的学术丛书,通常是衡量一个学科、一个课题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75年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长达50年之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大题目,在此之下,可以做的课题很多。如从大的方向分,可以有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政治、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经济、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外交、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文化、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社会、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军事等;从历史时段上分,可以有蒋介石与北伐战争、蒋介石与国共内战、蒋介石与抗日战争、蒋介石与台湾、蒋介石与重要历史事件等;从蒋介石个人经历与生活分,可以有蒋介石的青少年时代、蒋介石的晚年、蒋介石的读书生活、蒋介石的家庭生活、蒋介石与宗教、蒋介石的人际关系、蒋介石的心理分析等。以上只是简单罗列,每个课题下面都还可以细分出子课题,如“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外交”主题之下,又可分蒋介石的国际观、蒋介石与美国、蒋介石与日本、蒋介石与苏联、蒋介石与英国、蒋介石与亚洲小国等课题。如此众多的题目,需要更多的学者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其中。

我们的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已确定列入丛书的著作,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包括蒋介石研究学术史、蒋介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蒋介石与战时经济、蒋介石与战时外交、蒋介石与集权政治、蒋介石与青年、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等。大多数作者是年轻学者,他们大多了解些新的史学理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大量运用扎实的档案资料,做实证研究。这是蒋介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

关于“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我们的设想分两步:首先是在未来三年内出版8—10部,构建一个基本的框架;最终是出版20部,确立一个研究体系。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更欢迎有更多的优秀学者将相关研究成果纳入丛书之中。

## 五

史学研究的过程艰辛而枯燥,而对涉猎蒋介石相关研究的学者来



说,艰辛与枯燥之外,还多了些难与人道的压力与无奈。甘苦自知,点滴在心!

综观学术史,蒋介石相关研究时有曲折。但只要对中华民族有信心,对中国社会一定会进步有信心,就该相信此一研究的价值及前途。南宋诗人杨万里有描写溪水在山间曲折行进的诗句:“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蒋介石相关的学术研究已是千辛万苦流到山脚前的溪水。我们不避艰难。我们毅然前行。我们坚信学术有正道,学者有良心,坚信“梅花香自苦寒来”,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

写作之时,电视里正在重播着《中国好声音》,优美的歌声让人动容,百听不厌。我想,学者们的努力伴随时代的进步,蒋介石研究或许也能成为史学研究中的“好声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即将出版,欣喜之余,作此短文,简述丛书渊源与进程,权且为序。



2012年11月10日于杭州仿秋斋分号

# 导 论

陈红民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2010年4月9日至12日召开“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编辑此书时,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春暖花开之际的那次学术盛会的情形。

蒋介石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与近代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代表该领域研究水平的标尺之一。多年来,前辈学者们为召开一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不断努力,他们的辛勤努力终于获得成果。会前,中国大陆首次举办蒋介石学术研讨会的消息,在海外引起很大关注,美国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曾就此采访我,问何以会议得到批准,我的回答是:“中国大陆学术气度比过去好很多,对历史问题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有勇气与雅量对待历史上的各种人与事。”

中国人做事讲求师法自然,一件事的成功通常被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首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能顺利举行,确实离不开这三条:天时,首先是指研究大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使得整个学术研究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与雅量来评价历史上的人与事;其次是经过学者们的艰苦努力,中华民国史研究、蒋介石研究取得巨大成果,国际交流日益增加,已形成了“突破”之势;再次是《蒋介石日记》与档案的相继开放,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蒋介石研究俨然成了史学界的“显学”。地利,是指会议在蒋介石的故乡

浙江召开。浙江大学于2007年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蒋介石相关研究及交流，召开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就是当初的目标之一。人和，是指国内外学者的通力合作，踊跃支持，尤其是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获悉会议将举行的消息，愿意加盟，参与合办。这样，大陆首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由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学术单位共同参与，更彰显出非凡的意义。

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美国和韩国的四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既有年愈八旬的学界泰斗，也有刚三十出头的青年学者，更多的则是目前活跃在研究领域的学术中坚，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襄学术盛举，呈现出薪传火递的完美结合。由于与会学者的密切配合与主办者的精心组织，会议圆满成功，达到了推动研究、增加交流的目的，得到各方的好评，教育部主管的《国际学术动态》刊发了会议综述，海外媒体也给予了非常正面的评价。《近代史研究》发了会议的学术综述，香港珠海书院的《亚洲研究》也出专刊分两期登载多篇会议论文。

与会学者各就其研究专长精心准备的会议论文，代表了目前史学界对蒋介石研究最新的高水平成果。会议结束后，学者们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润色。现汇集成册出版，把会议成果展示出来，也算是对学术界的一次汇报。

论文集的基本编辑思路是，依提交论文的内容大致分为几个专题，每一专题之中，又以内容所涉时间先后为序。为阅读方便，特将各专题论文大概介绍如下：

第一专题“蒋介石与民国政治经济”。蒋介石与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往论著多集中于此，此次会议涉及此一专题的论文有四篇。

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教授的《国民革命时期的蒋介石——以“四一二”政变以前的蒋汪关系为中心的探讨》，对国民革命时期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的基本结构和性质进行整理，认为军事力量压过了革命力量(或者政治力量)的情况成为国民革命的基本机构，蒋介石全面掌握主导权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教授的《节约、消费和新生活:蒋介石的社会经济思想》,着重探讨1934—1936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节约与消费观点,由于蒋介石关于节约的主张对于城市化的现代化的消费主义潮流而言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于缺乏最基本生活所需的民众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新生活运动最终未能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蒋的经济建设计划没有反映出19世纪末以来中国新兴工业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安徽工业大学方勇副教授的《蒋介石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突破学界主要从南京国民政府来“研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视角,力图以运动的发起者蒋介石为论述基点,探讨其经济建设运动开展过程中的诸多论述及相关思考,从而深化对蒋推动战时经济转型独特作用的理解。湖南科技大学刘大禹副教授的《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形成的历史考察——以五中全会前后为中心》,以召开国民党五中全会前后的一系列会议为中心,探讨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形成,分析这种政治模式的特征与发展路径。论文认为,蒋面对危局采取的政治妥协,以汪精卫遇刺为契机,最终完成权力集中的过程。在制度权威缺失、政党权威未建立时,蒋介石个人集权的形成既有其必然性,但也具有偶然性。

第二专题“蒋介石与抗日战争”。从1937年全面战争算起,抗日战争进行了八年;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的话,抗日战争进行了整整十四年,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漫长的抗日战争过程,国民政府内部有人对抗战持怀疑和摇摆的态度,甚至有人公开投敌。作为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态度和立场对战局的走向与结局显得十分重要。会议论文中讨论这一主题的相对较多,从广泛的视域探讨了蒋介石与抗战的关系。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肖如平副教授的《蒋介石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中心》,突破通常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与汪精卫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利用《蒋介石日记》等新史料,对蒋介石与此政策的关系作了新的探讨。台湾著名学者蒋永敬教授的《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的问题再研究》论文指出,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其实是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两个“底”:一为卢沟桥事变之“底”,是不彻底之“底”;一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底”,是彻底之

“底”。前者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之前状态为底限；后者是所有一切条约、协议、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这个底限也就是彻底恢复被日本占据的所有中国领土，不仅包括中国东北，还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在内。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的《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角度新颖，以蒋介石、王世杰、陈布雷、胡适、徐永昌、王子壮等名人日记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7月到1938年1月之间国民党高层人士在对日和战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在抗日战争迅速扩大，正面战场接连受挫的情况下，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也有过踌躇和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但在几个重要关头，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坚持了抗战的基本态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力研究员的《从决战到弃守：浙赣会战衢州战役蒋介石的抉择》，认为蒋介石在1942年初即判断日军将对衢州有所行动，并作了切实准备，论文通过新史料分析了蒋对衢州战役由决战到弃守的决策过程和心理变化历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王建朗研究员的《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分析了战时蒋介石及重庆政府利用苏联和盛世才的矛盾以及盛世才自身态度变化的契机，重新确立中央在新疆之权威的过程。二战爆发后，苏联无力东顾，苏联和新疆矛盾开始显现，盛世才也开始考虑重建新疆与中央的关系。蒋介石抓住机会，利用刚柔并济的方法，使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新疆终于回到中央辖制之下。学术界既往对中国抗战时期动员体制的关注不够，日本庆应大学段瑞聪教授的《抗战、建国与动员——以重庆市动员委员会为例》便着力于此。该文以个案分析的方法，通过探讨1938年11月至1942年6月期间重庆市动员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及其活动，来分析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动员民众，以及重庆民众如何回应。

会议论文中，也有涉及抗日战争对战后中国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的《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初步探讨了蒋介石在南京大屠杀案调查过程中的角色，指出从南京大屠杀发生到抗战胜利，蒋介石都十分重视对日军暴行资料的搜集，然而限于时局，调查未能

继续和深入,资料的缺失也为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借口。关于如何清算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日本敬爱大学家近亮子教授在《“战争责任二分论”在中国的源流——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抗日战争的叙说方式》中提出,国、共两党有尖锐的政治对立,但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所谓的“战争责任二分论”:把战争的责任仅归咎于一部分军人,而把日本国民视为“无辜者”(或是与中国人民一样的“受害者”)。该文分别考察了蒋介石、毛泽东和周恩来自抗战开始对战后的构想,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如何提及日本的天皇制及日本国民的。文章认为,所谓“战争责任二分论”原本是高度政治性的历史认识问题,其目的在争取日本的国民。

第三专题“蒋介石与民国外交”。民国时期是中国外交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人艰苦奋斗从屈辱走向独立,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蒋介石有着怎样的世界观,他当政之后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和最终决策对中国外交走向有重要的作用。会议有四篇论文涉及这一主题。

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的《蒋介石的日本经验——以高田时代为主》,以大量新资料介绍了蒋介石 1910—1911 年在日本高田的生活,包括考证蒋介石到达高田的日期,高田时代蒋介石的风貌、成绩及其在高田时期的军人生活等,矫正了史实,更清楚地展示了“日本经验”对蒋日后所产生的影响。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一文,探讨了 1939 年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蒋介石对这一事件的应对。该文从欧洲局势对中日两国的影响问题、如何应对欧局问题、何种状态的结盟关系对华有利问题等六个方面归纳了蒋介石对日苏德关系及国际形势的基本认识。由于蒋介石有“日苏必战”的情绪,使其对苏联订约动机产生错误判断,但是当事情的发展与其愿望背道而驰之后,蒋介石迅速修正中国外交的战略构想,做好对日作持久抗战到底的总战略。四川农业大学张祖尧副教授的《蒋介石与战时“是盟非友”的中英关系——以“结盟基础”为中心》,以蒋介石的外交策略为线索,纵向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英两国的“结盟基础”,并由此探讨中英结盟后“盟而不和”的激烈矛盾,以及南京政府在争取结盟中的种种

艰辛努力,从而揭示战时中英外交“是盟”却“非友”关系的实质。香港珠海学院博士生蒋啸琴的《蒋介石与废除不平等关系条约探讨》,主要论述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平等新约的过程。

第四专题“蒋介石的人际关系与修养”。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难免的,人际关系重要而复杂。蒋介石的崛起与政坛沉浮,均与其人际关系与个人修养有极大的关联性,其与人交往过程中难免出现“公”与“私”的复杂性,对周围的人和重要事件则会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会议中涉及蒋与其他民国人物关系的论文较多。

南开大学江沛教授《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一文指出,南开大学发展历程中,蒋介石与校长张伯苓的关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抗日战争中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后在张伯苓的努力以及与蒋介石的沟通之下,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迁移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对南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抗战结束后,南开又获得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得以复校,并由私立改为国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研究馆员与徐妍合作的《1946:蒋介石与戴笠关系异变研究》,纵览蒋介石与戴笠由交易所的主仆到黄埔军校的师生,再到戴笠追随蒋介石的上下级关系,双方由互相信任到彼此猜忌,最终戴笠暴卒的全面历程,展示了两入关系的复杂性。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刘晓宁的《略论蒋介石与林森的关系》一文,阐述了林森在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关系融洽、和睦相处,但无深交,林对蒋虽是全方位支持,但也并不是完全盲从。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教授的《党国荣辱与家族兴衰——析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对孔祥熙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由于孔祥熙世故圆滑和驯服的性格特点以及早年全力支持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所以一开始蒋对孔是信任有加。孔祥熙及其属下利用职权,大肆敛财,甚至大发国难财,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攻击。蒋对孔的行为异常愤怒,但考虑到案情的真正公开将会影响党国的统治和家族荣誉,最后只是撤去孔的职务,追缴其不法所得,而没有追究孔祥熙的刑事责任,将偌大一件贪腐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有两篇论文涉及蒋与其他人物的承继与比较关系:台湾大仁科技大学林爵士教授的《蒋介石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拥抱与修正》,分析了蒋介石

与国民党人对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的理念采取修正立场,而非全盘照搬的过程及原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研究员的《共识与歧见——论左舜生与蒋介石》,详细列举了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在不同时期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关系变化,尤其是他们在政见方面的异同,并结合时代特点予以评价。关于蒋介石个人修养与特质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过去的研究强调蒋介石从小便受儒家教育和母亲笃信佛教的耳濡目染,而对其与宋美龄结婚后皈依基督教的情况较少论及,台湾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的《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文从蒋介石关于基督教的公开言论、蒋日记中所显现的基督信仰,以及蒋介石对《圣经》的研读等三方面进行了讨论,清楚地描绘了基督教的思想在蒋介石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也拓宽了对蒋言行诠释的思路。

在所有论文中,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邵铭煌主任的《蒋介石现形记:蒋日记与胡照相相对映的身影》独树一帜,该论文跳出传统论文的纯文字论述模式,尝试采用以《蒋介石日记》的记述与其御用照相师“胡照相”拍下的珍贵照片,相互参照,图文并茂地呈现出蒋介石日常工作与生活的侧面,新颖生动,是一种很不错的大胆尝试,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 with 书写模式。

第五专题“蒋介石与浙江”。浙江是蒋介石的故乡,是其一生事业的出发点。这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在浙江召开,适得其所。与会学者注意到了浙江在蒋介石研究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几篇相关论文。

台湾辅仁大学林桶法教授的《蒋介石的亲族关怀——以日记与家书为中心的探讨》一文,突破过去稗官野史对于蒋介石亲情的描绘,利用蒋日记与家书等第一手资料来了解其亲族关怀,探索其内心的真正情怀。该文主要讨论了蒋介石在奉化的重要亲族网络、对母亲之眷念以及关心亲族的具体表现等侧面。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教授的《地缘纽带中的蒋介石与浙江——以国民政府建立前后为时段的考察》,则透过地缘纽带,对国民政府建立前后这一时段进行考察,分析了蒋介石与浙江的关系。该文认为,蒋执掌中枢之后大量起用浙人,既是中国传统官场上援引乡人的“腐习”,也与浙江各类人才涌现的基础相关。蒋介石对浙江的地缘认同,没有超过蒋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



研究中心方新德教授的《从〈蒋介石日记〉看蒋介石的故乡情结》一文,大量引用《蒋介石日记》中对浙江,特别是奉化溪口的赞美之词和思念,展示蒋对故乡自然风光的热爱。对故乡的热爱是“半由山水半由人”,蒋介石对家乡事务的关怀,说明他的乡情和对家族的亲情紧密相连。两篇来自溪口当地的论文,充满了乡土史学的气息,溪口博物馆周金康、裘国松的《溪口民国史史料辨正与拾遗》一文,图文并茂,介绍了大量与蒋介石相关的史料与史迹,对若干史实进行了考订。王舜祁的《民国第一镇——溪口在民国史上的地位》充分肯定了民国时期溪口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溪口能否称为“民国第一镇”,有与会学者提出了商榷。

蒋介石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研究与评价,始终是见仁见智,争论纷呈。与会学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研究的背景有差异,研究的方法、角度各不相同,对史料的解读各有体会。有着不同观点的学者在会上有着热烈的争论与交流,这是高水平学术会议的标志之一。学者的风格各异,为使全书接近,编辑过程中,我们进行了若干技术处理,如对论文格式、注释方式进行统一,对过长的论文稍加压缩,但所有论文的基本观点与史料均保留原貌,以尊重学者的研究自由与独特见解。然而,这并不代表部分学者的观点得到所有与会者认同。

一次学术会议,不可能面面俱到,解决所有问题。限于规模与时间,会议对蒋介石研究的许多重要议题并未涉及,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时期种种弊端、错误、政策失误及其在大陆失败原因的分析探讨等。这些问题学界已有相当多的成果与基本共识,可为日后深入探讨的基础。

学术研究是在交流中不断进步的过程。研讨会的闭幕式上,专门进行了“蒋介石研究的未来:做什么?怎么做?”的专场讨论,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学者们大致得出了两个共识:(一)蒋介石研究要走向深入,要脱去附着他身上的诸多“属性”,使他从一个“政治符号”回归到本人。蒋介石长时间作为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领导人,其言行对国民党及其政府有相当影响力,但并非所有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决策都由蒋介石制定。既往的研究未将什么是国民党的政党行为,什么是国民党政府的行为,什么是蒋介石个人的行为加以严格的区隔,常常是混淆在一起。蒋介石档